

抗战文史研究[1辑]1—21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 lawrence 发布时间: 2011-8-29 11:04:30 阅读: 次

中国大陆地区近年来的日本侵华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综述

张海鹏

一、关于中日关系史综合研究

孙乃民主编的《中日关系史》三卷本，是近年来我国史学界有关中日关系史著述中的一部分分量较重的本子。著者引用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古代、近现代及当代中日关系史做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考察。该书第一卷设五章，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止于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第一至第四章，主要叙述自汉代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日两国间存在的各方面的关系，尽管其中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主流是友好交往史。在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双方互有借鉴、互有促进。但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第五章主要叙述，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两国间在上述各方面存在的友好交流关系，尽管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未曾中断，仍在向前发展，但就其主流说，却发生了全面逆转。两国关系中的主导方面，是日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侵略关系，并且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加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是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特别是向日本人学习拯救中国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内，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关系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该书第二卷论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9月）止31年间的中日关系史。这段历史虽然时间跨度小，但经历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等重大历史场面。因此，这段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中日关系史发展过程中最令人不忍卒读的一页，也是中日两国值得世世代代引以为鉴戒的一页。该书第三卷主要论述了中日当代关系史，所谓当代中日关系史，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以来的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具体地讲，是指这一历史时期两国之间以政治、经济关系为基本内容，兼及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内的关系发展过程的历史。该书着重论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对于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该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中日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是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中日两国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正式结束战争状态，就消除了能够导致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因素。”①此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它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大道越来越宽广，使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往来大门敞开，当代中日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①

胡德坤、韩永利合著的《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中国抗战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巨大影响和牵制作用，中国持久抗战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巨大打击和制约作用，中国战场对太平洋战场、北非地中海战场、苏德战场、西欧战场以及印缅战场的巨大支援，对英美苏等盟国的重大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在推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中的作用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考察和探讨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书中指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目的就是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目的体现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之中。……但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中国抗日军民以血肉之躯和民族精神与智慧进行英勇抗战，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妄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②作者指出：“战后初期确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总框架，至今未有大的改变，二次大战带来的战后世界进步是战前前所未有的。战后60年来，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全人类都在分享着二次大战胜利的成果。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今天，世界各国和人民享受的二次大战成果中，也渗透着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鲜血与汗水。”②

王振德著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一场反法西斯性质的战争；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战时间最长，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作者认为：“中国战场迫使日本不可能分出应有的兵力侵占澳洲，进攻中东，夹击苏联，德意日军事协定形同废纸，法西斯侵略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军事实体。而英、美、苏各盟国之间不仅在军事上可以东西呼应；而且由于航路畅通，在战略物资上也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战斗力。这不仅对大战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大战的总进程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③

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是日本侵华史）

关捷等学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作者认为：“旅顺大屠杀是在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同意和批准下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城暴行。”作者通过对日军军官的回忆著述进行分析后，指出：“旅顺大屠杀惨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是亲自发布过屠杀密令的日军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是他部署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很明显，这样一次大规模持续5天之久的屠杀，如果不是日军依照战场指挥官的命令或得到更高层次的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大将乃至日本政府、天皇的同意或批准，不但合理，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发生。”④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和史料继续出版。由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是一部由315位亲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文字编辑而成的证言集。全书分别揭示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6周的集体屠杀、零散屠杀、性暴力、抢劫焚烧破坏、对南京城狂轰滥炸等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当时的各慈善团体收埋受害者尸体的情况，史料翔实。这些受害者们以自身的经历，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确证了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存在。吴广义编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则依据加害方、中立方和受害方的照片及文字等第一手资料，采取图文互证、图随文行的体裁，依时间顺序，逐月逐日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我国南京、台湾等地搜集了大量史料和各类档案，整理、翻译了一千五百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包括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大量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记录，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以及战后中国国民政府所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还收录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研究日军侵华暴行的著作，在这个文库中占有一定分量。其中，史丁对日本关东军的侵华理论及其暴行做了详尽的历史考察与梳理。作者指出：“关东军的所作所为表明，它是一个十足的侵略者和战争罪犯。它犯下战争屠杀罪、反人类罪、侵略别国主权罪和领土罪、研制和使用细菌罪、化学武器罪等重大罪行。然而遗憾的是，战后在美国的庇护下，关东军乃至日本法西斯的许多重大罪行并没有受到追究。如关东军的细菌、化学战犯被掩盖起来，而其犯罪的恶果至今仍在毒害着中国人民。在中国东北仍遗留有大约200万件细菌、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对东北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并没有结束，关东军的犯罪问题仍在继续。”⑤

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是辽宁境内万人坑的大型调查报告集。全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系统介绍日本侵华时期，在辽宁省的旅顺、平顶山、新宾等地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在抚顺、本溪、北票、阜新、大石桥、弓长岭、鸭绿江水丰水电站、大连金州龙王庙、铁岭乱石山等地开采矿藏、修建水电工程和军事工程中，进行疯狂经济掠夺、残酷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工，形

成了一个个大型万人坑的基本情况。作者认为，辽宁境内的万人坑从形成的原因上归纳，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规模屠杀形成的万人坑，主要有旅顺大屠杀万人坑、抚顺平顶山大屠杀万人坑和新宾境内万人坑。二是经济掠夺形成的万人坑，主要分布在各大型矿山，包括抚顺煤矿万人坑、本溪煤矿万人坑、北票煤矿万人坑、阜新煤矿万人坑、大石桥镁矿万人坑、弓长岭铁矿万人坑。三是修建大型工程形成的万人坑，主要有水丰水电站万人坑、大连金龙王庙军事工程万人坑和铁岭乱石山军事工程万人坑。

陈先初以详实的历史资料，研究了日军在湖南境内施暴、屠杀无辜的种种恶行，向世人展示了不堪回首的一页痛史，也为当年远东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中认定的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即反人类提供了新的佐证。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调查后指出：“在近代战争史上，日本发动的对中国的那场侵略战争是最不人道的战争，侵华日军是一支极为残暴、极为野蛮的杀人部队。”⑥

谢忠厚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运用新的档案文献和调查资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做一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揭露与研究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的史书。书中通过对日军实施的“无人区”、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以及强制劳工、对妇女的性暴行等大量“恶行”的调查，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华北伤害平民犯罪之普遍，之残暴，亘古未有。”⑦日本侵略者把华北视为“日满华经济圈”的骨干部位，不遗余力掠夺华北的财力物力以补充日本及伪满之“缺需”。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制与掠夺，与其在东北的做法有所不同：一是对华北沦陷区经济的统制与掠夺更加疯狂；二是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破坏与掠夺采取了毁灭政策。为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由日军扶植下的汉奸政权开展所谓的“思想战”，提倡反共、亲日、做顺民的“新民精神”，推行以“反共誓约”为中心的“新民运动”，培植奴才。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步平等学者在充分的历史考察和现实调查的基础上，全面揭示了日军实施化学战的罪行。作者指出：“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化学战是相当残忍的行为，也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能不能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并进行深刻的批判，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也是必须经受的考验。”⑧

杨玉林等研究了七三一部队的所谓“特别输送”问题。作者们除了引证史料，还先后在黑龙江、辽宁、山东和北京等大量采访受害人遗属及见证人，对日军实施的“特别输送”这一骇人听闻的犯罪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实证考察与论述。日军将其拘押的抗日民众或抗日战士“定为”所谓的“特别输送对象”，由日军宪兵队将他们秘密押送给哈尔滨宪兵队，再转交七三一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害致死。该书作者经过调查证明，“日军的细菌战实验迫害的主要对象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秘密抗日分子，或者说，日军是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隐蔽战线上的抗日志士。”⑨作者强调：“‘特别输送’是日军七三一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第一步、关键环节。它最直接、最明显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野蛮、反人类、反人道本性。”⑩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伪政权研究，近年也有新作问世。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和郭贵儒等著《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是代表作。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实行殖民统治的主要策略。1937年在北平粉墨登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来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在关内扶植建立的最大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登台”的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沦陷区最大的傀儡政权。这些伪政权在协助日军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和扩大侵略等方面曾起过极为恶劣的作用。以上著作研究了华北伪政权和汪伪政权的兴亡历史，对该伪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活动进行了比较系统地阐述，勾勒出该伪政权的演变情况，剖析了其汉奸理论的反动性，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和新事证，进一步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欺骗性和暴虐性。

周瑞海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方位论述了回族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过程。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是中国抗日救亡斗争的组成部分，也是回族史上的重要内容。“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种当代意识与爱国主义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这一点，在回族抗日战争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⑩作者指出“大敌当前，回汉人民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出发，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从中华大地上消灭日本侵略者，回汉各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持，携手抗日。这说明回族人民认识到回汉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⑩“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回汉人民、回汉革命战士尤其是回汉先进分子的团结合作分不开。”⑩

李广民著《准战争状态研究》，是把国际法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日关系历史研究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从九一八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虽多次在中国挑起武装冲突，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更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但无论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自卫抗战的中国，都没有明确表示开战的意向，日本始终坚持按“事变”处理中日关系，国民党政府也迟至1941年12月才公开对日宣战。这种有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存在，而交战双方却都不愿将其宣布为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就是所谓“准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际法是如何适用的？为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国联在制度安排和各方的作为到底怎样？卢沟桥事变后，处理中日纠纷的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为什么相继失败？日本扶持伪满洲国，谋求国际承认，有什么国际法的涵义？日本“不宣而战”，国民党政府“战而不宣”，日本发表的“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国民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其国际法的涵义如何？研究者查阅了中日双方的历史档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孙乃民主编：《中日关系史》第三卷，第329、345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版。

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19、477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

王振德：《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440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关捷主编：《旅顺大屠杀研究》，第116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史丁：《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前言第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

陈先初：《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第10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谢忠厚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第17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步平等编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60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版。

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一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第22、3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周瑞海等：《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第515、481、485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抗战文学和重庆文化
——一个台湾“外省人”的观点

张汉良

抗战文学在文类划分上，属于一个层次复杂的特殊的现象。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它同时包括了文学断代问题，如：到底抗战文学应当如何作年代的划分？主题学问题，如：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就是抗战文学吗？写在战争期中，发生的其它事情，算不算抗战文学？以及更复杂的文学定义问题，比方说，到底可不可以根据情节、故事，还是人物、背景来界定某种文学范畴？在比较文学研

究上，它涉及到国别文学中的特殊区域文学现象。上述各种问题，需要详细的论辩与厘清。如果我们把抗战文学定位在重庆，它显然又涉及到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重庆作为抗战基地的历史事实，以及重庆师大作为抗战文史研究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我对重庆有特殊的感情，也许不妨就从重庆开始谈。我从小就是讲四川话长大的，大学以后，才和父母讲他们的方言山东话。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讲四川话？这是内地读者很难理解和想象的。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1949年以后，重庆文化在台湾各地继续发展。大家都知道，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之后，撤退到重庆作为抗战的基地，因此这段历史，也是国民党政府参与建构的历史。几十年前，台湾人流行说重庆精神。现在很少人知道这句话了。我小时候，听说的重庆精神，就是全民抗战精神。这也许和今天所谓的重庆精神不大一样，重庆精神言人人殊。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移民精神。因为抗战期间许多外省人，撤退到重庆，被称为下江人。这句话有点像台北人，称呼台湾南部人为的下港人一样。他们建构了多元的重庆文化。在1950、60年代重庆文化，在台湾获得一种延续。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有相当一部份四川人，尤其是重庆人。他们多半是空军眷属，因为当年国民政府的空军撤退到重庆。这些空军官兵，娶了川娃儿，在1949年，他们随着部队到了台湾，发展出独特的眷村文化。在50、60年代，眷村的官方语言，不是普通话或者台湾话说的国语，而是四川话，严格地说，应当是重庆话。就这点而言，重庆语言在台湾获得延续。

虽然这个现象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但重庆文化对后来台湾这个移民社会文化的多元性，肯定有部份影响。就文学而言，眷村文化竟然在台湾发展出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眷村文学。几个有名的作家，朱天心、朱天文、朱天衣、张大春和袁琼琼，他们未必是四川人，但多少受到重庆语言生活习惯的影响。这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都可以看出来。前几年有人开始研究台湾的眷村文学；这一两年，王伟忠和赖声川制作电影和戏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这种情形下，重庆文化似乎又可以扩大了，而且和台湾发生了密切的结合。

现在让我回到抗战文学这个题目。如果我们把中日战争扩大范围，走出重庆的历史框架，把台湾纳入讨论的范围，大概有下面几个方向可以切入。第一，中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广大的沦陷区的文学生产与消费，这个沦陷区包括早在1895年就已经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后来的伪满洲国，以及战争期间国际色彩浓厚的上海等地区。如此以来，我们的文学视野无形中便扩大了。各位都熟知的作家张爱玲，便是有名的沦陷区作家。

台湾的情况尤其特殊，由于长达五十年的日本统治，中文作为创作语言是相对的弱势，被殖民的台湾作家即使学习汉字，或者用它来创作，都属于地下的活动，作家绝对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写抗战文学。从这个观点而言，台湾的抗战文学应该是一片空白，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读到一本日本小说，是德富芦花（1868-1927）的《不如归》（1900，林纾中译1909），情节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让我始终模糊地记得中间的一段对话，男主角说：“我希望到台湾去……”那时台湾才割让给日本不久，显然台、日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如果台湾没有抗日文学，那是否表示在五十年统治中台湾没有抗日的行为呢？这种推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曾经发生过雾社事件以及许多其它抗日事件。据台湾史学者张炎宪观察，台湾人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反抗运动，是以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为分界。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是武装抗日运动时期；后期自1915年至1945年，是政治抗日运动时期，如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赴日请愿设立台湾自治议会。据总督府统计，殖民时期，台湾当地的武装抗日行动共有14起。这些事件也或多或少地成为文学的题材。

另外有一个在台湾相当为人熟知的文学类型，称作高砂文学。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有相当数目的原住民，或称高山族，被征召训练派往南洋，参加太平洋战争，今天一般人称呼他们为高砂部队。（附图）

由于这些高山族，在血缘上，和在太平洋岛屿的马来裔接近，生活习惯也接近。因此日本人特别训练他们，派往南洋作战，战死的人数不少。以高砂部队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出名。早年有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近年有林耀德的《1947高砂百合》等史诗性小说。这些作品的盛行，甚至可以从附录的网络文学看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为高砂文学定位？如何把它和抗战文学挂勾？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沦陷区文学”的观点来切入。前面我谈到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文学的现象，也曾经提出台湾文学是否可以归属于沦陷区文学。我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历史断代的问题。一般人把抗日战争的时间定位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这段期间，为时一共八年。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八年抗战。但是沦陷区的历史远远超过这八年抗战的历史。就中国大陆而言，有人从918事变开始算起，把抗战文学扩大到1931到1945年。这个说法也没有太多人怀疑。一旦我们把台湾纳入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断代的困扰。

严格说来，台湾不属于沦陷区。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和香港一样，是殖民地，而不是二战期间的沦陷区。由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可以算是国别文学和比较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因为当时的官方语是日语，老百姓使用的语言则是闽南语，或者说台湾话。前面曾提到，中文或者当时所称的汉文，只能在民间和地下流传。这种语言的分裂现象，使得作家创作时，要做一种存在的抉择：到底是使用日文创作？还是使用中文创作？我认识的许多作家，包括笠诗社的早期诗人，如桓夫，开始写作时，是使用日文的，台湾光复之后，才开始学习中文，用中文创作。和他类似的作家不在少数，包括吴浊流，他们用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妾身未明。到底属于日本文学？还是属于中国文学？这个问题在大陆上的学者可能无从关心起，因为他们不熟悉。

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张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是2005年一个学术会议论文集的集结。他所处理的沦陷区，包括北平（北京）、东北和上海。有趣的是，其中有一篇论文竟然讨论《沦陷时期北平台湾文化人的主要心态》。这是本书唯一讨论到台湾形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何标，以老沦陷区称呼抗日战争之前的日据时代的台湾。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和香港、澳门的情况一样，台湾是满清政府割让给外国的——除非我们重新定义“沦陷”这两个字。当年台籍青年不甘心在日本统治下，接受安全的日式教育，并且需要服兵役，成为日本军人。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来到北京，念书或留下来担任教职。日据时代台湾学生无法选择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念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的青年人大多数来到大陆。有两位曾经做过我的老师，一位是洪炎秋，另外一位是林朝荣。这两位早年在北京教书，1949年之后撤退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教书。

由于台湾长期接受日本的统治，在日本法律上属于日本国民，作家自然不敢公开写反抗日本的文学。这使得研究台湾的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呈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台湾文学和欧战沦陷在德国统治下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不同，没有抗战文学。北京社科院的学者张泉，曾经撰写论文，认为台湾皇民化时期的文学，不属于沦陷区文学。他的看法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性（《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一期）。最近几年，大陆的学者，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研究，也着力甚深。下面几位学者有相当的贡献：陈小冲、粟多桂、苏光文这三位作者在90年代都有一些初步的发现；此外刘德军在2005年《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中对这段文学史也作了简略的补充。我认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涉及到海峡两岸学者，对历史和文学史的不同看法，甚至还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前后对抗日战争的不同解释和评价。这是一个极端敏感的课题，需要两岸的学者，集思广益，共同合作，以便得到一个比较全盘的观察与结论。

附录

高砂百合

——前高砂义勇队志愿兵南洋作战实录

（一）出征

疾行如风不动如山，我们是云豹的后裔

额头环绕百步蛇刺青，青筋在黝黑的皮肤里跳动

骁勇善战的丛林战士即将踏上征尘

泰雅族人列队送行，战鼓擂动撼山震谷

回音里风起云涌天地为之动容

百合花插在军帽上，山风在枪管里唱着雄浑的进行曲

饯别的小米酒流过咽喉，命运交给神灵

环视故乡山林旷野，我们牢记着长老的叮咛

莫忘云海深仇，莫忘日人加诸于我族人的痛苦

四十多年来那些趾高气扬的统治者

曾经把我们践踏在脚下，如同蔓生的藤叶伸出层层手掌
用各种制度和苛捐税杂企图窒息我们，
我们的父祖以鲜血淋漓的双手不停地拨开缝隙
抵抗反击，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今，虽然我们被迫替仇人参战
但我们没有忘记，要活着回来，回来改写历史
立足于我们的土地作自己的主人
像百合花站在泥土里大声唱着自己的歌

覆雪的山头踮起脚尖向少北方远眺，就能望见轮廓
站在运兵船甲板上，我们是一把把出鞘的弯刀年轻雪亮
透着摄人魂魄的血气，腥味的海风扑打着我们青春的发肤
海浪不时溅起船舷跟我们握手
拍着肩膀，我们彼此以坚定的眼神相互约定
只活在今生，不作来世殊途的人鬼

（二）战斗

抵达纽几内亚，随即加入战斗编制，整装待命拂晓出击
突击爆破是我们的任务，漆黑的夜幕是绝佳的迷彩
树影是我们的黑色风衣，密林间我们潜行如豹疾走如风
狡黠的身手原是出于狩猎的本能
抓起藤蔓飞身荡过山谷，如悬丝游走的蜘蛛
或者壁虎一般，徒手攀岩爬上悬崖峭壁
潜入敌军制高点阵地，仿佛梦境里突然飞出一支致使吹箭
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如鬼魅般垂天而降迅速发动攻击
在历次的行动中，我们是令敌军闻之丧胆的杀人武器

（三）存活

战争是一只不能打开来看究竟的黑盒子
里面或许有一两片领袖发亮的头盖骨
将军的金质勋章以及几份不可告人的密约
但肯定没有安魂的符咒与和平的乐音

在飞虫必经之路蜘蛛织起网罟，然后耐心等待
等待猎物自投罗网；猎人埋设陷阱设置圈套，捕捉经过的猎物
在人类的战斗中，所有的诡计与布局都是为了猎杀对方
人类是绝无仅有的冷酷的兽类相互残杀搏命
猎杀人或者动物对于我们高砂族人都是相同的经验和感受
因为他们同样都会拼命，并且抵死反抗
而格斗是为了存活，存活下来的人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然后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及评论战争
军事行动中伤亡是难免的，我们是猎人同时也是猎物
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像一只闹钟
被扣扳机的手轻轻按一下就停止呼吸和脉搏
然后在逐渐失去知觉中惨然走出这场战争

（四）败退

战局逐渐明朗，我军的军事行动节节败退
败象逐一浮显，搁浅在每个军士的眼前
仿佛潮退后裸露的潮间带，水洼里满是仓皇失措的鱼虾贝类
补充兵员及军需补给逐月锐减，粮食医药管制配给
在战斗的空档，我们开始狩猎飞鼠、鸟兽，采集野芋野菜和浆果
而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在军士身上悄悄旅行着
我们的战力是漏了的水壶正一点一滴消失中
苦苦支撑着我们与敌军及虫蛇疾病继续搏斗的意志
不是来自长官一再重复的训勉
而是心中坚定活着回去，见到族人的那份信念
我们盘算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日本帝国的气数
那枚有着十数道光芒的东方太阳
困在不见天日的密林里早已失去活力
等战争结束，回到故乡
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些败战的日本人和他们血腥的樱花
从我们的土地上连根拔起，投入太平洋

（五）原始人

有时是蜷伏在地穴里的土拨鼠，有时则是树干上折枝而息的飞鼠
在与世隔绝的密林里，我们像鼠辈般衣衫褴褛没头没脸地活着
战斗逐渐平息，敌军不再深入密林，向我们的临时阵地推进
放松戒备，我们四处采集食物汲取饮水
像在故乡山林里那样，过着原始的生活
把野栗子捣成粉状，加入野菇和兽肉熬成鲜粥
或者调水，用文火烘焙成小饼随身带着果腹
剥下兽皮缝制衣物，采集细藤编织出鞋子
钢盔当成汤锅，长长机枪弹上晾着洗好的衣服
而各种蛇类和鼠类被捕来，没有严刑逼供没有反复侦讯
剥了皮摘除内脏就直接下锅，然后汤鲜美地进了我们的五脏
我们的身体成为十方蛇鼠们灵魂共同皈依的神社
闲下来时，有人斜倚着树干吹口琴，有人以军刀整理茂盛的须发
更多人伸伸懒腰，然后以各种安适的姿势从容地进入梦乡

（六）投降

天皇的投降昭告果然也是从天而降

敌军军机每日凌空洒下雪片般的传单
败战的消息使我们心中暗暗雀跃起来
虽然表面上仍必须伪装有些许哀伤
对于这样的结局，长官们其实早有预感
我们接受最后一道命令：整装，集体走出森林
就近向联军部队缴械投降
带着罹难弟兄的骨灰和遗物
列队走出密林，我们重返文明社会
在战俘营里等待遣返

(七) 还乡

恶梦已经远离，浴血重生的感受恍如隔世
运兵船上我们愉快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享受阳光和海风温柔地吹拂
远远望见能高山脉，白云盘旋如蛱蝶轻舞
我们朝北方故乡招手，那美丽的岛屿苍蓝如昔

踏上归乡路，眼眶里热泪流转
部落的山林宁静幽美，如同神话里的仙乡
我们俯身投地，亲吻着这片芬芳的泥土
活着回来，族人把百合插在我们胸前
斟上满满的小米酒，熟悉的歌舞自山谷间冉冉响起……

抗战时期重庆市的居住分布变动

内田知行

前言

对抗战时期重庆市每月的人口变动及户籍类别、职业类别的变动，笔者已在另一篇论文中进行了考察【1】，但尚未对随着抗战发展市内各区的居住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因此，本文以这一问题为中心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与空袭的关联。换言之，就是通过分析居住变动这一地域“面”的变动，来了解人们的居住（生活）是如何维持、或被破坏的。本文打算从居住圈的破坏和其之后的再造这一角度，更进一步了解空袭的情况。至今为止，有关“重庆大轰炸”问题，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大多是仅累积空袭被害的个别事例进行考察，据笔者所知，尚没有从本文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考察。首先，说明市内各区的特征；第二，根据重庆市政府和市警察局的资料系统弄清各区的居住变动情况。迫使居民居住变动剧烈的基本原因是日军的轰炸。但是，国民政府从保护居民的立场实施的2个政策也对此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是“疏散政策”，另一政策是应对轰炸的防空洞建设；第三，对“疏散政策”和防空洞建设这两个决定居住变动的政治原因的效果进行考察。

第一、重庆市内各区的特征

表1描述了抗战时期重庆市内各区的特征。重庆市最早的中心是在长江与嘉陵江所夹半岛地区建设起来的旧城区（第1~3区）。到20年代后期，把城墙拆毁，在旧城西侧建立了新市街区（第4~7区）。1929年2月，根据国民政府“市组织法”（1928年8月制定），重庆被确立为一级行政区所辖市，开始了城市化进程。1933年，半岛区的市区范围扩张到红岩嘴至黄沙溪一线（第8区），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县城也被编入市区（第9、10区）。同时，长江南岸上游千金岩至下游苦竹林的广大地域被编为第11、12区

【2】。1941年2月开始大幅扩张市区，将半岛区西郊已经迁入许多学校和工厂的沙坪坝、瓷器口文化区编为第14区，将其西面的歌乐山地区编为第13区，将石桥铺至长江上游九龙铺的地域编为第17区。另外，还将嘉陵江北岸江北县城至下游地带编为第16区，长江南岸第11区至下游地带编为第15区。至此，抗战时期重庆市的市区范围大致确定。表1描述了市区大幅度扩大后各区的所辖镇、人口密度、各区的特征。半岛的旧城内外是一般居住区及商业、居住区。旧城内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其次是旧城外，其它地区人口密度高的还有江北/旧城内地区。有特色的是瓷器口、沙坪坝所在的第14区以及南岸的第11、12区。前者不单是学校、工厂集中的地方，而且是行政中心。后者早就是招揽工厂企业的工业区。

表1 重庆市内主要乡镇（市区扩张以后）

半岛部 / 旧城内	1945.1 / 人口密度(人 / 平方km)
第1区：龙王庙、太华楼、马王庙、镇江寺、白鹤亭	(一般居住区) 67030.3
第2区：桂花街、太阳沟、蹇家桥、北壇庙	(商业、居住区) 74331.9
第3区：段牌坊（火神庙）、东华观、东升楼、王爷庙	(商业、居住区) 96441.5
半岛部 / 旧城外	
第4区：观音岩、骡马店、安乐洞	(一般居住区) 45589.2
第5区：石板坡（雷家坡）、金马寺、宝善寺、菜园坝	(商业、居住区) 25818.5
第6区：张家花园、曾家岩、大溪沟	(一般居住区) 27879.0
第7区：上清寺、两路口、中山二路	(一般居住区) 26143.6
半岛部 / 郊外	
第8区：李子坝、化龙桥、黄沙溪、新市场、遗爱祠	(郊外居住区) 5907.5
第13区：歌乐山、高店子、新桥、上桥、山洞	(农业、郊外居住区) 1110.8
第14区：小龙坎、磁器口、沙坪坝、金沙街、童家桥	(工业、文化、行政区) 5813.2
第17区：石桥铺、歇台子、鹤皋岩、九龙铺	(农业、居住区) 1244.2
江北 / 旧城内	
第9区：米亭子、木关街、四方井、体仁堂、三洞桥	(商业、文化区) 9640.0
江北 / 郊外	

第10区: 猫儿石、陈家馆、刘家台、石马河、香国寺 (工业、居住区) 2616.7
 第16区: 溉澜溪、寸滩镇、唐家沱 (农业、郊外居住区) 1022.2

南岸

第11区: 玄坛庙、龙门浩、弹子石、穹角沱、鸡冠石 (工业、商业区) 4701.6
 第12区: 海棠溪、铜元局、南坪场 (工业、居住区) 2834.1
 第15区: 清水溪、大兴场、黄桷崖 (农业、郊外居住区) 954.9

其它

水上区: 朝天门?千厮门?香国寺?弹子石?海棠溪?黄沙溪?磁器口的各码头

(出处)各区所属镇名出自《重庆市各区镇国民月会参加人数统计表》(《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2卷 战时动员)》、261?263页)。

(备注)“人口密度”依据重庆市政府编刊《重庆要览》1945年4月、15页。1942年6月农会会员人数多的区是第13区10896人、第15区10780人、第16区8226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3卷 战时社会)》、125?126页)。

第二、重庆市内各区的居住变动

下面从各区居住变动的统计数据方面进行考察。表2是1941年2月市区大幅扩张以前的居住变动数据。从该表可以看到1939年和1940年的空袭遭受的打击。表3与表4是市区扩张以后的居住变动数据。从表3可以看到1941年的空袭遭受的打击,从表4可以了解到空袭结束后人口的稳定?长。但是,表3、1941年3月与6月的数据几乎完全相同,众所周知,6月上旬发生了“大隧道惨案”,3个月期间居住情况完全没有发生变化这似乎不太可能(据笔者调查,3月人口大约有61万,6月大概?加到了67万左右)。笔者推测,可能警察局因为忙于处理“大隧道惨案”事件没时间进行户籍调查,所以就直接借用了3月的数据。即使看上去再严谨的资料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纰漏。举此事例,意在说明即使是当事者写成的原始史料也不能盲信。

笔者根据表2、3、4制成了表5。由表5可以得出以下的推断:

1) 1939年春季至夏季的空袭受害极大。其中以半岛地区的旧城内受害最大,另外还波及到旧城外、江北县旧城内及南岸第12区。这可以由1938年10月/1939年7~8月显著的居住变动反映出来。同时可以推断出为应对受害,坚决实行了“疏散政策”;

2) 从1939年7~8月/1940年12月的居住变动来可以推断,半岛地区的旧城内(第1~3区)、江北第9区、南岸第12区都没能恢复到1938年10月的居住规模。这是由于在1940年春季至夏季,猛烈的轰炸一直持续不断。实际上,1940年的受害比1939年的受害更大。相对1939年“日机空袭重庆30次,出动飞机59批809架,人员伤亡4437人、损毁房屋4827栋”的情况,1940年达到“空袭重庆80次,出动飞机191批4727架,人员伤亡4232人,损毁房屋6955栋”的规模【3】;

3) 从1940年12月/1941年11月的居住变动可以推断出,1941年春季至夏季半岛旧城内的第3区、半岛旧城外(新市街区)的第4、5、7区遭受了严重的空袭打击。另一方面,南岸第12区的数据又显示出尽管受害严重,但街区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4) 1941年11月/1943年6月和1943年6月/1945年1月显示的居住变动情况都是空袭结束后的数据。1941年11月/1943年6月半岛地区除了郊外第14区、江北第16区的居民只是稍微?长之外,其它区的居民都是陡?。1943年6月/1945年1月,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居民开始了从郊外向市中心的迁移。半岛地区旧城内外各区(第1~7区)的居民人口持续?加,而半岛地区郊外各区(第8、13、14、17区)及南岸第15区、江北第16区的居民人口?长趋势都已经停止。如果把表4、1945年1月/1946年6月的居住变动数据计算出来的话,可以断定这种趋势会更明显。

表2 重庆市内各区人口变动(市区扩张以前)

	1939年7、8月	1940年12月	1938年10月
半岛部 / 旧城内	人数/户数	人数	人数/户数
第1区	25118/ 5251 【a】	38205	(第1、2区) 176084/41734
第2区	24899/ 7753 【b】	32068	
第3区	9569/ 3352 【c】	38308	
小计	59586/16356	108581	
半岛部 / 旧城外			
第4区	27405/ 6770 【d】	32297	(第3区) 98109/25090
第5区	36801/12955 【e】	44634	
第6区	n.a./ n.a. 【f】	20167	
第7区	16964/ 4052 【g】	17699	
小计	81170/23777	114797	
半岛部 / 郊外			
第8区	21741/ 5140 【h】	23931	
江北 / 旧城内			
第9区	28048/ 6727 【i】	35144	(第5区) 65294/14499
江北 / 郊外			
第10区	6740/ 1713 【j】	23456	
南岸			
第11区	n.a./ n.a. 【k】	68155	(第4区) 85582/20657
第12区	38041/ 6926 【l】	43415	(第6区) 77827/16213
小计	38041/ 6926	111570	163409/36870
总计	235326/60639	417479	502896/118193

(出处)1938年10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保甲户口数统计表(1938年)》(《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3卷 战时社会)》、1页)。而月份的确定参考自《重庆市警察局民国二十九年度统计年鉴》1941年刊、23页,区的排列参考自余楚修、管唯良主编《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1998年、45页,及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177页。1939年7、8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各区各联保现有保甲户口面积调查表(民国28年7、8月报告)》,重庆市档案馆?警察局0061-16-3679(户口调查统计)。另外,1939年7月的总人口299365人、户籍数74889户(参考《重庆市警察局民国二十九年度统计年鉴》、23页)的这一数据比表中的总计数据要大。1940年12月的数据参考《渝市各区人口与各区避难设备容量统计表》(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重庆出版社、1995年、90页,不过这一数据是引自《重庆陪都第一届防空节纪念特刊》1940年12月)。

(备注)联保名:【a】龙王庙、太华楼、马王庙的合计。【b】夫子池、桂花街、太阳沟、北檀庙的合计。【c】老关庙、段牌坊、东华观、东升楼、王爷庙的合计。【d】观音岩、骡马店的合计。【e】金马寺、石板坡、菜园坝、宝善寺的合计。【f】大溪沟、张家花园、曾家岩。【g】两路口、上清寺、中二路、中二路。【h】浮图关、黄沙溪、遗爱祠、化龙桥、新市场的合计。

【i】木关街、四方井、体仁堂、三洞桥、溉澜溪等的合计。【j】刘家台的数据,陈家馆的数据无法判定。【k】龙门浩、玄檀庙、弹子石等。【l】海棠溪、南坪场、铜元局的合计。

表3 重庆市内各区人口变动(市区扩张以后)

	1941年3月	1941年6月	1941年11月
半岛部 / 旧城内	人口/户数	人口/户数	人口/户数
第1区	38806/8017	38786/8017	41799/9364
第2区	38189/8092	38189/8092	39760/9072
第3区	30603/6742	30603/6742	30774/5943
小计	107598/22851	107578/22851	101258/24379
半岛部 / 旧城外			

第4区	37233/8223	37233/8223	30336/8124
第5区	43422/9718	43422/9718	37192/10820
第6区	20442/4657	20444/4657	24550/4263
第7区	17814/3453	17814/3453	19329/3404
小计	118911/26051	118911/26051	111407/26611
半岛部/郊外			
第8区	23901/4183	23901/4183	26127/4443
第13区*	30409/4511	30409/4511	33411/6047
第14区*	89150/9536	89150/9536	103302/8812
第17区*	11668/3136 ※ a	11668/3136 ※ a	n.a./n.a.
小计	155128/21366	155128/21366	162840/19302
江北/旧城内			
第9区	33323/8363	33323/8363	36385/9052
江北/郊外			
第10区	38504/5679	38504/5679	51236/9785
第16区**	21279/4434	21279/4434	29147/6022
小计	59783/10113	59783/10113	80383/15807
南岸			
第11区	73948/14082	78858/15413	88686/16646
第12区	41835/9097	41835/9097	50672/10143
第15区*	28535/6281	23625/4950	26030/5748
小计	144318/29460	144318/29460	165388/32537
其它			
水上区***	—	—	—
总计	619061/118204	619061/118204	668736/127688

(出处)1941年3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各区镇保甲人口数目统计表(民国30年2月编整完竣)》、重庆市档案馆?警察局0061-16-3902)。1941年6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各区镇保甲人口数目统计表(民国30年6月)》、重庆市档案馆?警察局0061-16-3902)。1941年11月参考《重庆市各区镇保甲人口数目统计表(民国30年11月)》、重庆市档案馆?警察局0061-16-3902)。(备注)*: 1941年3月该区人口由巴县编入。**: 1941年3月该区人口由江北县编入。***: 该区从1941年3月以后开始进行人口编制。※ a: 原表记载第17区是“直辖镇、石桥镇”。

第4表 重庆市内各区人口变动(市区扩张以后)

	1943.6	1943.9	1944.3	1945.1	1946.6
半岛部/旧城内	户数/人口	户数/人口	户数/人口	户数/人口	户数/人口
第1区	11154/56839	11005/56563	11252/57501	14220/68473	15246/76015
第2区	11104/55313	10962/51852	11751/55631	13873/69872	14255/75683
第3区	8565/39389	8635/39270	12040/46836	11187/62687	11916/55710
小计	30823/151541	30602/147685	35043/159968	39280/201032	41417/207408
半岛部/旧城外					
第4区	9101/45115	8646/42673	11118/51065	13053/55163	14918/66011
第5区	12503/50867	12715/57812	13160/59276	16130/65321	18163/75822
第6区	4841/26939	5246/28445	5639/36278	8171/49346	8974/47175
第7区	4536/31468	4566/31504	5687/39122	6497/47320	8201/43127
小计	30981/154389	31173/160434	35604/185741	43851/217150	50256/232135
半岛部/郊外					
第8区	5730/38304	6009/41348	6685/41527	7340/41471	8699/44473
第13区	8472/52644	8515/58064	8528/58248	8110/55166	10234/60978
第14区	8954/103628	8934/103228	8912/103493	8968/103301	12573/79144
第17区	6114/42089	6480/49128	7849/47449	7018/44083	7484/51522
小计	29270/236665	29938/251768	31974/250717	31436/244021	38990/236117
江北/旧城内					
第9区	9211/37875	9256/43331	7760/45370	11152/48875	11890/53071
江北/郊外					
第10区	11631/66700	11466/66741	11412/56782	12248/77141	11802/81471
第16区	6216/29942	5850/32351	5901/32601	6783/33234	5852/29264
小计	17847/96642	17316/99092	17313/89383	19031/110375	17654/110735
南岸					
第11区	18967/107630	19882/110386	20269/112222	21780/120127	11938/62413
第12区	10814/53060	10777/61355	10547/58132	11243/65866	12389/72010
第15区	5392/31882	5600/33014	5701/33099	6033/33307	5773/27935
第18区		(1944年9月从第11区分离)		9394/56583	
小计	35173/192572	36259/204755	36517/203453	39056/219300	39494/218941
其它					
水上区	2429/9189	2393/8795	2743/8835	2292/8697	2231/8432
总计(人口)	878873	916160	943467	1049450	1066839

(出处)1943年6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民国32年4月至6月)》、99页。1943年9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民国32年7月至9月)》、69?70页。1944年3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政府编刊《重庆市统计手册》1944年、11页。1945年1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政府编刊《重庆要览》1945年4月、15页。1946年6月的数据参考《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民国35年1月至6月)》、《市政统计提要》。

第5表 重庆市内各区别居住变动比较表

	1938.10/39.7?8	39.7?8/40.12	40.12/41.11	41.11/43.6	43.6/45.1
半岛部/旧城内					
第1区	n.a.	13087	3594	15040	11634
第2区	n.a.	7169	7692	15553	14559
第3区	n.a.	28739	-7534	8615	23298
小计	-116498	48995	3752	39208	49491
半岛部/旧城外					
第4区	n.a.	4892	-1961	14779	10048
第5区	n.a.	7833	-7442	13675	14454

第6区	n.a.	n.a.	4383	2389	22407
第7区	n.a.	735	-1630	12139	15852
小计	-16939	n.a.	-6650	42982	62761
半岛部 / 郊外					
第8区	n.a.	2190	2196	12177	3167
第13区*	—	—	—	19233	2522
第14区*	—	—	—	326	-327
第17区*	—	—	—	n.a.	1994
小计	—	—	—	31736	7356
江北 / 旧城内					
第9区	-37246	7096	1241	1490	11000
江北 / 郊外					
第10区	n.a.	16716	27780	15464	10441
第16区**	—	—	—	795	3292
小计	—	—	—	16259	13733
南岸					
第11区	n.a.	n.a.	20531	18944	12497
第12区	-39786	5374	7257	2388	12806
第15区*	—	—	—	5792	1425
小计	—	—	—	27124	26728
其它					
水上区***	—	—	—	—	-292
总计	-203531	118114	270464	210137	170577

(备注)*: 1941年3月该区人口由巴县编入。**: 1941年3月该区人口由江北县编入。***: 该区从1941年3月以后开始进行人口编制。

(出处) 根据表2、3、4制作。

第三、“疏散政策”与防空洞建设

(1) “疏散政策”

抗战开始后，日军开始了对沿海大城市的空袭，之后扩展到内陆各城市。重庆市于1938年秋天开始开展防空运动。首先，于1938年9月设立了重庆防卫司令部，作为本市的最高防空指挥机关。1939年2月下旬，在重庆市政府内设立“紧急疏散委员会”，开始正式执行疏散政策。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3月上旬宣布“自动疏散”，3月11日开始了强制疏散。另外，还使用各种交通工具配合疏散。在此行动期间，发生了“五·三”、“五·四”大轰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事件发生后，汽车、民船大量被调用来支援疏散。至5月7日为止，约有25万人撤离到近郊各县【4】。

1940年1月下旬，重庆市参议会开始针对“疏散”展开讨论。2月中旬，重庆市政府提出分期分阶段进行疏散的政策，更进一步执行强制性的疏散。封了不响应疏散的“无证居民”（没有居住证的居民）的房子。4月下旬，重庆市警察局向一般市民下达了疏散命令。5月初，为了强化疏散政策，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制定了包含三个项目的“疏散办法”【5】。6月中旬，为了使疏散顺利进行，市政府要求各种交通运输部门提供协助。这一年度的疏散活动一直严格开展到8月下旬。

1941年，从3月中旬开始正式执行疏散政策。首先将“无证居民”作为强制疏散的对象，之后更进一步强化了对他们的疏散。4月下旬以后，更是调动汽车、民船支援疏散活动。但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5月下旬，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又制定包含四个项目的“疏散办法”【6】。决定从7月21日开始开展“疏散宣传周”活动，全面进行疏散。这一年度的疏散活动也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

1942年，早在1月初，市政府就下达了疏散的通告，但对市民正式的疏散开始于2月末。4月初提出利用交通工具进行疏散。可是，疏散的推进却相当困难。5月下旬，市政府公布“执行强迫疏散人口实施要则”，并付诸实施【7】。

日军对重庆市的轰炸在1942年以后基本停止了，但是在这之后政府还继续提倡执行疏散政策，在1943年也进行了强制的疏散。1944年4月，市政府还制定了从5月开始实施16万人规模的强制疏散计划。但是，这一年空袭一次也没有发生。1943年以后，政府已经认识到空袭的结束，但仍以此为口实进行疏散，企图让市民移居郊外。可是民众没有响应，疏散政策没有取得成效也就这样结束了。

二战时期日本也执行了针对空袭的疏散政策（日语称“疏开政策”）。但是，中国的疏散政策与当时日本的“疏开政策”差异甚大。日本也是由军司令部和地方政府制定、执行计划。中国的特点是：

1) 强制性大。而且疏散的对象是被称之为社会不稳定分子或是社会不良分子的“无证居民”及“无业游民”。1940年1月，重庆市发出训令，决定了分两个阶段要疏散的对象。第一阶段要疏散的对象是：“1，无职业者；2，无生活连带关系之老弱妇孺；3，与抗战无关之自由职业者；4，已疏散之中央机关、地方机关不必留渝之职员及其眷属；5，摊贩商人。”第二阶段要疏散的对象是：“1，无治安勤务与负有交通通信责任之公务人员及其眷属；2，中资产以上工商厂号、不必留渝之店员及其眷属；3，各娱乐场所之无证演艺员。【8】”要疏散对象的典型是“算命”，市警察局1941年的年度报告中有“彻底疏散卜筮星相”这一条目。其理由如下：“卜筮星相等人民，小则传播迷信、大则顺逆通奸，此类人民潜迹于市者甚多。前经卫戍总部规定，对市内此项人民严厉执行疏散。”【9】对“无业游民”，市政府1941年的年度报告中记载道：“凡应行疏散之市民如系无业游民得拘留留报请着其服兵役”【10】。也就是实行“不响应疏散就抓去服兵役”的方针。而居民中有相当多的“无证居民”（1940年12月~1941年2月有56%~59%），这一点笔者已在其它论文中进行了论述【11】。据警察局的调查，在1943年10~12月期间，半岛部第4·7·8区、江北第10·16区和水上区壮丁28909人中有1949人是“无业游民”（相当于6.7%）【12】。

2) 疏散的实际情况是将市内的人口从稠密区域迁往重庆周边各县。因此制定了“对于无居住证人民，仍须继续督促疏散，并禁止入境”的方针【13】，即“不许返回”的方针。1938年11月，国民政府“重庆难民总站”决定的、作为“疏散地点”的地域包括重庆市周边相当广阔的地域。具体有江北、长江南岸（巴县）、璧山、永川、合江、綦江、江津、来凤驿、邱亭铺、荣昌、李市镇、隆昌、内江、松坎、泸州、纳溪、江安、南溪、宜宾、合川等【14】。包括泸州、纳溪、内江、南溪、宜宾等远离地在内有相当多的地点被定为疏散候补地。但是，这些并非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于是，在1939年2月，重庆市社会局将江北、巴县等近郊各县设定为“疏散区”【15】。另外，1940年重庆市制定的《重庆市难民调查登记及安置办法》决定将江北、巴县乡区、江津、璧山、铜梁、永川、綦江、涪陵、长寿等县作为暂定的“疏散地点”，要求难民“在上列指定安置地区以内，得自由申请择定”【16】。

以上论述了重庆市疏散政策的开展过程和特点。疏散的宏观情况，目前限于资料不足尚不清楚。换个视角，那些被选定为“疏散地点”的重庆市周边各县的人口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39年，重庆市在与其接壤的巴县和江北县设立了“迁建区”，意在用作一般居民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的疏散预定地，迁建区的范围相当于到当时巴县歌乐山以北的青木关、歇马场为止的地域及北碚一带（被定为“嘉陵江三峡村实验区”的巴县北碚乡于1942年改组为北碚管理局，等同于县）。表6描述了作为最重要的“疏散县”江北、巴县的人口变动情况。表7描述了包括这两县在内的重庆市周边“疏散县”的人口变动情况。

1940年9月以后和1941年2~3月期间，随着江北、巴县的所辖区域逐渐被划入重庆市，两县的面积及原始人口都有所减少。江北的人口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为止持续减少，之后?减反复不定。巴县的人口在1938年急剧减少，1941年又继续减少，之后一直到1944年为止持续?加。尽管县域大规模缩小，但从两县1941年的人口都减少得十分少这一点可以推断出这是由于有“疏散”人口的迁入，还使得幼年的人口也有所?加。江北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男丁被征召入伍迁出去，巴县也应该有同样的现象发生。当然也应该有“疏散者”往重庆的回流以及对这些县的轰炸造成的人口?减。在“疏散”县、地区当中，有巴县、璧山、北碚管理局这些人口?加的地方，也有江北、涪陵、长寿等人口减少了许多地方，也就是说这三个县人口的迁出超过迁入。与从1941年秋天开始重庆市人口的持续?加相对应，许多“疏散县”的人口持续减少，这也说明了疏散政策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而人口规模十分小的北碚管理局却发生了显

著的人口?长,这应该是“疏散”的成果。不过,如后文所述北碚防空设备完善,本身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城市,因此能够保障在空袭后的废墟上居住和开展经济活动。也正因为是个小城市,所以也经常有许多交易和就业机会。

第6表 江北、巴县的人口变动(1937?1945年)

江北	总人口 / 男性 / 被征兵男性	巴县	总人口 / 男性
1937	n.a. / n.a. / n.a.		911492 / 487741
1938	591769 / n.a. / 1275		798944 / 438128
1939	576768 / n.a. / 3868		799530 / n.a.
1940	535403 / n.a. / 4717		799530 / 429469
1941	507367 / 249996 / 4452		793946 / 426886
1942	539333 / 274520 / 4774		808481 / 433067
1943	535306 / 271861 / 7064		809713 / 433915
1944	553785 / 287128 / 5229		828352 / 440551
1945	n.a. / n.a. / 4110		822048 / 434454

(出处)江北的数据参考《抗日战争中江北县大事辑要》、重庆市渝北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渝北文史资料》第1辑(总第10辑)1995年8月、206?219页。巴县的数据参考《巴县志》重庆出版社、1994年、642、649页。

第7表 抗战时期重庆市周边各县的人口?减表(1941.7 / 1943.9的比较)

减少县	减少人数	1943.9.总人口	?加县	?加人数	1943.9.总人口
1 ※涪陵	-130460	792740	奉节	34578	389555
2 ※长寿	-59107	327231	※璧山	9720	325095
3 ※江北	-30999	523188	丰都	9085	489097
4 万县	-23876	824353	北碚管理局	5875	87600
5 开县	-21887	589228	巫溪	3558	161179
6 云阳	-18918	471161	垫江	2782	136281
7 梁山	-13050	378922	城口	2769	77889
8 ※永川	-11248	370193	※巴县	1820	799448
9 ※綦江	-8702	381923	巫山	18	
10 忠县	-8144	444682	—	—	
11 大足	-7530	357733	—	—	
12 潼南	-6118	273389	—	—	
13 ※铜梁	-6043	408225	—	—	
14 ※江津	-4651	814652	—	—	
15 合川	-4245	674655	—	—	

(出处)1943年9月的数据参考内政部统计处编刊《各省市户口统计》1944年12月、12?16页。1941年7月的数据参考内政部编刊《后方各省市户口统计》1943年9月、16?18页。

(备注)以现在的重庆直辖市(1997年设置)的区及市辖县为对象。※表示1940年制定的《重庆市难民调查登记及安置办法》中的“疏散地点”。

(2) 防空洞建设

配备空军部队和高射炮基地迎击防御敌机空袭的方针被称为积极的防空政策,而为保护一般居民的生命财产修建防空设施的方针被称为消极的防空政策。限于篇幅,本文对前者的考察只好割爱,就后者进行考察。消极的防空政策从引入灯火管制制度、空袭警报系统开始,包括着手进行作为避难管制系统一部分的防空设施建设。1937年9月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市半岛地区修建防空壕及公有、私有防空洞。同年12月下旬,以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市政府、成渝铁路工程三者为主体,开始在半岛地区的旧城内进行大规模的防空大隧道测量调查。1938年8月2日,举行了大隧道的开工仪式,开始进行开凿。另外,从这一年开始,江北、南岸各区也着手开凿防空壕、洞。虽然由于1939年5月初的大轰炸,防空设施建设遭受了打击,但是同年8月设立了“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积极地开展了隧道和防空洞建设。可是,由于市政府建设资金的不足,建设时断时续。

1941年6月发生的“大隧道惨案”给了防空设施建设很大的教训。第一,7月撤销“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成立“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专管全市公共防空洞、壕及隧道工作,组织清洁队负责管理全市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之清洁事宜;第二,命令民间自己修筑私有防空洞,恐吓否则就将进行强制疏散,即“限令各大旅馆、餐厅、医院、娱乐场所、公司、工厂、行号等在1942年3月前一律建筑防空壕、洞,否则即勒令疏散。【16】”1943年7月末、蒋介石发布了“以后重庆市新辟之防空洞,无论公私应先呈请核准”的命令。这其实是在事实上下达了停止防空洞建设的命令,8月20号以后市内的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18】。

重庆市的防空洞设施建设是怎样进展的呢?表8对其概况进行了统计。1940年(月不详)是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的数据,1941年10月是同年6月的“大隧道惨案”发生的4个月之后,即防空设施建设积极开展以来的3个月之后的数据。虽然该表没有统计,但1943年11月有关防空设施的数据与1944年12月的数据基本上相同。例如,1943年11月,“公共防空洞”有280个、“私有防空洞”1531个,合计1811个,可以收容人数达420018人【19】。如上述,这是由于1943年8月以后防空洞工程全部停工的原因。

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和以后的地区名称有一些差异。扩张以前,半岛地区的郊外即扩张以后的第13、14、17区称为“郊外区”,扩张以后的江北第16区称为“江北分局”,扩张以后的南岸第15区称为“南岸分局”。市区大规模扩张以前,这些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尚未被编入重庆市,而属于“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所管辖的地域。另外,当时没有准备水上居民的防空洞,而他们的数据在1941年的资料中被作为“特别区”统计。由于作为码头生活者的这群人没有修筑“私有防空洞”的能力,所以政府为其修筑了“公共防空洞”。

由表8可知:第一,当初积极修建了许多“公共防空洞”,但是后来由于有些防空洞设备质量低劣而被淘汰,数量减少了许多;第二,防空洞建设的重心是被区分为“机关洞”、“保甲洞”、“保民洞”的“私有防空洞”。但是,各种“私有防空洞”的设备质量相差极大,而且利用也很不公平【20】。

表9在表8的基础上,以居民1000人为基准,统计出了各区的防空洞可能收容者的比率。这里仅从量的方面讨论,各区大体上都是在遭遇惨案后的1941年秋天比率最高,可收容过半的居民。据笔者分析,“过半的居民”这一可能收容者比率,是满足根据空袭受害构建的安全防御之必要条件。北碚管理局模仿重庆市的空袭受害情况,从1940年起开始全力修建防空洞。1941年修建完成了防空洞61个,可收容4.2万人(1941年7月的人口约为8万人)。防空洞建设达到这种规模后,北碚没有再因空袭受害【21】。但是此后重庆市内的可能收容者比率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空袭结束后总人口骤?及1943年8月以后防空设施建设停止的关系。

防空洞建设工程停止后的保护维修工作十分松懈。1944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公布了关于防空洞质量的调查结果,内容显示“防空洞内险情严重、急需维护”。此后,政府设立了“防空洞改善委员会”,从民间募集修理费用。但是由于费用不足,修复工作受到挫折【22】。

第8表 重庆市市内各区防空洞统计

	1940年(月不详)		1941年10月		1944年12月	
	公/私/计	收容人数	公/私/计	收容人数	公/私/计	收容人数
半岛部 / 旧城内						
第1区	39/25/64	12502	25/75/100	60907	26/92/118	29106
第2区	25/30/55	12480	15/35/50	14118	16/71/87	21736
第3区	21/42/63	10815	6/57/63	9233	7/57/64	16183
小计	85/97/182	35797	46/167/213	94258	49/220/269	67025
半岛部 / 旧城外						

第4区	41/25/66	13762	16/65/81	21765	14/68/82	17605
第5区	52/30/82	17109	17/73/90	13887	18/114/132	23319
第6区	36/93/129	21591	19/70/89	31716	18/73/91	20274
第7区	24/35/59	11976	18/49/67	11917	19/87/106	49085
小计	153/183/336	64438	70/257/327	79285	69/342/411	110283
半岛部 / 郊外						
第8区	34/5/39	10180	25/81/106	36541	25/208/233	46354
第13区	—/—/—	—	n.a./94/94	26125	1/110/111	19339
第14区	—/—/—	—	21/47/68	63416	26/99/125	21243
第17区	—/—/—	—	n.a./60/60	16770	n.a./58/58	7686
郊外	37/n.a./37	11795	—/—/—	—	—/—/—	—
小计	71/5/76	21975	46/282/328	142852	52/475/527	94622
江北						
第9区	31/—/31	8942	25/29/54	12830	32/36/68	16859
第10区	36/—/36	13382	16/62/78	41266	18/125/143	30195
第16区	—/—/—	—	n.a./13/13	4014	4/25/29	5803
江北分局	—/55/55	2563	—/—/—	—	—/—/—	—
小计	67/55/122	24887	41/104/145	58110	54/186/240	52857